

关东军罪行录

——日本侵略东北史

岛田俊彦 著

潘喜廷
庄 严 译

辽 沈 书 社

1991年11月·沈阳

第一章 建立与性质

一、关东军诞生的阵痛

所谓关东军是从日俄战争后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止，驻扎在满洲，扮演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急先锋角色的殖民地军队。这支军队从开始就称“关东军”是名不符实的。明治38年（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重新统治了“关东州”，称为租借地（3,462,445平方公里）和满铁附属地（430余公里铁路线及以铁路线为中心约62米宽度的铁路用地）。想不到对该地区的统治，达到惊人的程度。不仅如此，而且自从这些地区在日俄战争中，随着战争的进展，成为日军的重要兵站（输送兵员、武器、弹药、粮食的后方勤务）基地以后，在原有的守备任务上再加上兵站、民政事务，就确实处在接连不断地混乱和纠纷之中。总而言之，关东军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于大正八年（1919年）诞生的。要想了解其性质，则要有稍微介入到过去的混乱之中的必要。

二、满洲军的“独立”

明治37年（1904年）2月，日俄开战不久，4月，黑木为桢大将率第一军从朝鲜西海岸的镇南浦登陆，北达鸭绿江岸，

击败俄军，5月初进入满洲，夺下九连城和凤凰城。从此开始，在各地击败俄军的日军，于6月迅速北上，至此攻守的大局已定。

为适应这种战局的开展，6月20日，日本天皇批准满洲军总司令部的编制，任命参谋总长大山元帥为直属天皇的总司令官。大山总司令官率幕僚进入满洲，“统率特命的几个军（独立师团）指挥作战”（《满洲军总司令部勤务令》）。这就使满洲军从日本国内军队那里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地位，尤其是最高指挥机关的组织形式能达到这一步，实际上在陆军中央内部曾发生过很大的对抗。

对立的中心是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分歧。参谋本部的设想，要在前线设陆军大总督府，统辖对外出征陆军的指挥、统帅、监督权，同时有任免将官以下的人事权，而陆军省方面对此立即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根据这个制度，大本营的权限几乎全部被大总督府夺去……，有颠倒军令系统之嫌”，主张缩小参谋本部。总之，这可以说是军政系统对军令系统，所表示的一个对抗。对这一对立，大山参谋总长上奏，此时可特别任命陆军总督，仅委以临战各军的指挥权。天皇批准了高级司令部（满洲军总司令部）的编制，这样大致问题得到了解决。

关于局方面，进入9月，辽东半岛几乎全部被日军控制，因此，确保这些地区的兵站线，越来越感到困难，而且占领的地盘扩大，守备与军政的确立，已成燃眉之急了。可是满洲军总司令部，对于前线部队，倒是可以全面指挥，但未能掌握供给任务的后勤兵站线的指挥权。因此大本营就要考虑在各占领地区设立统辖的军政署，对占领地的守备，

设一强有力的军政机构，处理各种事务。基于这一想法，于8月14日重新设立辽东守备军，由天皇直接任命西宽二郎大将为司令官。该司令部设在辽阳，统一承担辽阳以南兵站、守备和军政的各项任务。辽东守备军的兵力，大约有6个大队以上，这是与第一线无隶属关系的独立守备队，这点和后来的关东军有些相似，但又不能说是关东军的前身。因为辽东守备军不具有关东军以俄国为假想敌的“向北进攻的军队”的基本特性，也不具备其精锐程度，仅是后备兵的集团，这与“孩子一听到就吓得不敢哭”的关东军是不能相比的。这支守备队，不久就解散了。把这支守备队与驻满洲的日军在系统上连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翌年即明治38年（1905年）5月，辽东守备军被正式全部撤销，代之在满洲军总司令部内设该军总兵站监部，在总兵站监（儿玉源太郎大将）指挥下，又新设关东州民政署，负责关东州民政事务。最初设满洲军总司令部时，军令系统主张，而被军政系统否定的指挥机关与后方兵站一体化的意见，这时才勉强得到实现了。

三、关东总督府的成立

对兵站和占领地，尤其是对于关东州的日本行政，大本营与总司令部的方针不一致，时常发生动摇。但作战方面经过反复苦战，不管怎样日军是要把俄军赶回北满去，后经美国周旋，召开了日俄两国讲和会议。会议虽然不能顺利进行，但终于在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结束了日俄战争。

在这个条约上，有关日本在满洲辽东半岛南端所谓“关东州”和长春（宽城子）至旅顺间的铁路（后称南满洲铁道即满铁，包括沿线和支线的煤矿有关权利在内），由俄国转让。此外在追加条款上，为保护铁路线获得了每1公里可以设置不超过15名的守备兵的权利。中国只能听凭日俄两国对中国的领土和铁路任意进行的交易。然而，在日俄讲和条约上，关于铁路与关东州租借权的转让，必须得到中国政府承诺为条件，所以日本从明治38年（1905年）11月起，就讲和条约与中国有关事项，在北京和清政府开始谈判。在谈判席上，中国方面试图削减日本在南满洲的新权益，但力量相差悬殊，万不得已，于同年12月22日全面按日本方面要求，完满地签订了《满洲善后事宜正约及附约》。根据善后条约，中国承认由俄国将南满洲一切权益转让予日本。这时中国代表袁世凯叹气地说：“日本以俄国拿去两支烟为理由，而拿走一盒烟”。

此外，在《朴茨茅斯和约》缔结不久，9月20日，制定了关东总督府勤务令。按此令新设关东总督府（直隶天皇），其任务为统帅指定的军队及其他机关，执行关东州的守备，同时监督民政，统管和处理财务、卫生、兵站的业务。一句话总督府一手承担日本对南满洲的经营。陆军大将大岛义昌就任总督，本部设在辽阳，完成了关东总督府的组建。

四、关东总督府的苦恼

日俄战后，关东总督指挥的驻守满洲的两个师团，约10,000兵力，这才是关东军的前身。说起来日俄讲和后，当

然日本有权在满洲驻兵。首先关东州领土和租借地一样，驻军是不受限制的。何况根据讲和条约附约条款规定，可以在满铁站线上每1公里配置15名守备兵（总计14,419名）。关东总督所辖两个师团的驻扎，就是根据这两个条约上权利规定而来的，这一点与后来的关东军情况一致。而且这两者之间，在系统上有着明显的联系，可以说毫无疑问，这支军队从开始就是关东军的前身。

然而，新建立的总督府，有许多亟待完成的事情，真是谈何容易。原来日本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就着手经营满洲各项事业，但像抱着没有提手的大包袱一样，感到又大又重，难于下手。首先遇到资金困难问题，日俄战后，政府为经营关东州，每年从一般会计转入350万元左右补助金，这决不算充足的金额。然而，对没有得到俄国一分钱赔款的日本来说，已是过重的负担。这是因为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经营殖民地的财政负担合起来相当于例年支出的60%。这样一来，除初期满铁经营时外资引进之外，做为殖民地经营则别无他策。

此外，当时围绕着亚洲的复杂国际关系，日本在满洲经营的前进路上存在着选择困难。俄国战败的结果，把南满洲转让给日本，但广大的北满仍然掌握在其手中，因此日本认为它为了维护其世界一流陆军大国的声誉，一定会在近期内与日本再战。明治39年（1906年）10月，山县有朋上奏的《帝国国防方针决定之必要》，其中他认为第一个假想敌国是俄国，第二个是中国。之后，看到决定中的国防基本方针是：海军的目标为“八八舰队”（以各为战舰8艘、巡洋舰8艘为主力的两支舰队），确立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以对美国战备

为目标。而陆军的目标为战时50个师，平时25个师，仍以俄国为假想敌国。虽然日俄讲和，满洲驻扎军队，仍未失掉面向俄国进攻的性质。

另外，日本，特别是军部，战后把欧美商人排斥于满洲之外的关门主义，使曾经标榜门户开放，战争期间与日本友好的美国舆论，变得冷淡。日美的背离，以及日俄战争后，在欧洲进行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即英法俄三国接近的新事实，逐渐地把日本赶出三国之外。与俄国过去有同盟关系的法国，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一方面想利用日本，阻止德国向远东插手，另一方面实现了与渴望利用法国金融市场的日本接近，于明治40年（1907年）6月，达成日法协议。该项日法协议的达成，一方面由于俄法有同盟关系，而该关系可以起到使日俄接近的引子作用；另一方面要求俄国必须改变侵略满洲的路线，使之朝向巴尔干、中东方面转变，基于这一现实愿望，于同年7月，缔结了第一次日俄协商。其内容是明确两国在南北满洲的势力范围界线，互相尊重分界线内的两国特殊利益，对日本与韩国的特殊关系，俄国予以默许，俄国在外蒙的特殊利益，日本亦须承认等等，均作了规定。还有，日俄两国对拥有这些地区主权的中国无须说一句客套话，就极其秘密地做出各分得最大利益的决定。

对此，美国根据以铁路建设为主体的经济合作与中国携手，企图扩大在满洲的权益。然而，这一计划随着中国内部政变——袁世凯（中国方面的主持计划者）一派暂时下台而遭受挫折。于是，日本方面提倡缓和紧张形势，日美之间出现了妥协的气氛。

由于上述资金困难与复杂的国际环境，作为一个后进的

日本，自愿承担力所不及的满洲经营的大包袱，实在是担负过重。至于开始时陆军在当地实行野蛮的军政控制，主要是因其陷于困境的一种焦急不堪的表示。第一次日俄协议达成后，日本内阁会议认为，俄国已经不能试图再向东方进行冒险活动，这一点虽已看穿，然而陆军，尤其是在当地的陆军，眼前面临俄国的雄厚实力，还不容易从其复仇战的恶梦中解脱出来。加之日本军政要员的基层人员，以及从内地一拥而入的无法谋生者一掠千金的行动，使军政素质日益恶化，日本在国际评价中声望降低。

五、伊藤博文反对军政

在日本国内，反对这样的军政现状的人，不在少数。主要的是以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为首的非军人政治家们。这样，围绕着满洲统治，陆军与政治家集团之间开始对立。第一次达到表面化就是加藤高明外相辞职一事。

加藤于明治39年（1906年）3月，辞去第一次西园寺内阁外相，是以陆军继续主张实行满洲军政统治，不能提倡门户开放为理由。加藤辞职后，暂时由西园寺公望首相兼外相，他从4月开始大约1个月时间，进行了非正式的满洲视察。他视察满洲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地现行军政的实际情况。与西园寺满洲之行相反，伊藤统监从任职的汉城去了东京。文治派的总帅伊藤的身边，有英国驻日大使马库多纳尔多和袁世凯等人述说苦衷。即或不是这样，他也看到了关东总督府的《军政实施要领》等文件，痛感军政带来的弊端，暗下决心准备对政府、军部、元老等劝告废除其军政，以参

加凯旋阅兵式的名义而回东京。于是5月20日，由伊藤统监首倡，在首相官邸召集元老及有关大臣、军部首脑，举行“满洲问题协议会”。会上伊藤提出，英美方面对陆军在满洲所采取的现行政策不信任，而中国方面抱有强烈的不满，并警告排日运动有激化可能，此刻应废除军政署，以缓解中国民心。同时还提出在将来至少还要指望英美的财政援助，应将大连贸易利益，分给他们等等。结果是伊藤等人（文治派）的主张，受到了儿玉参谋总长等人（武力派）的强烈反对，决定将关东总督府改为一般的行政机关，逐步废除军政署，并把它列为当天内阁会议的决定事项。结果，于9月1日废除总督府，终于改为关东都督府制，都督由大岛总督继续担任。

六、陆军与外务省对立

所谓都督府制，的确是复杂古怪。按官制，从陆军大将、中将中由天皇亲自任命的关东都督，除了管辖、防卫关东州，保护、管理南满铁路，监督满铁业务的任务之外，还掌握从总督府设置以来的在满部队的统帅权。因此，都督关于政务，受外务大臣的监督；军政、军人和军属的人事，受陆军大臣的监督；而作战、动员计划受参谋总长的监督；军队教育受陆军教育总监的监督，竟如此复杂。

还有，在满铁沿线附属地，对警察及其他事项宜等，不能委任满铁方面的事务，则在铁路沿线的重要地点，配备宪兵队，在都督府指挥下，与军事警察共同处理。满铁附属地是贯穿中国领土的带状地区，所以关东都督府的权限如果涉

及到该地区，自然而然、直接间接地要与中国政府和第三国政府进行交涉。都督府官制规定都督是外务大臣特别委任的，专事与中国地方官宪打交道。但是外务省总是设法加强驻满领事的权限，围绕“特别委任事项”解释问题，与都督府方面产生对立。都督府 = 陆军与在满洲领事 = 外务省之间的矛盾，直到日后也留有影响，作为关东都督府官制问题，使满洲统治的实态更加混乱。

原来的关东总督与新设的关东都督最大差别，主要是前者直属天皇，后者是要受外务大臣的指挥。然而，至少从中国和第三国方面来说认为这次改变仅是单纯地命令系统的更换，日本陆军大将、中将等最高权力者拥有两个师团的兵力，掌握南满洲军政两权进行统治，依然照旧执行军政制。

七、南满洲铁路

介乎陆军与外务省矛盾之间，使满洲统治更加复杂化的，乃是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存在。满铁是按《朴茨茅斯和约》规定，担任经营由俄国转让给日本的从长春（严格地说是宽城子）至旅顺间的中东铁路，以及其全部支线的使命。但是，这又不单纯是搞一个营利公司。满铁，除铁路运输业之外，还经营矿业，尤其是抚顺和烟台（辽阳）煤矿的开采、水运业、电业、仓库业等等的附属事业。并在铁路和附属事业用地范围内，建设有关土木、教育、卫生等必要的设施。其费的开支，则从用地范围内的住民那里，征收管理费及其他必要费用。就是说，满铁给附属地某种程度的行政权和征税权。

日本政府对满铁经营监督更是严格的。此外，有明文规定总裁、副总裁，经过御批由政府任命。由此可见，则无须赘述。满铁，如果它是掌握广泛的行政权的半官半民组织，倒不如说它是政府本身经营的国策公司。就是说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俄国的中东铁路公司是同一个类型，这里凝集着日本侵略大陆的方式。满铁第一任总裁，由被称赞业绩有贡献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担任。而后藤提出满铁总裁要兼任都督府顾问，以达行政一元化为条件，他又致函大岛都督一再叮嘱都督府顾问一职，不能以一纸聘书了事之后，才应允就任总裁之职。

八、满洲三巨头政治

但是满洲统治的现实表明，尽管后藤苦苦思虑，然而一点也没有形成一元化的领导。都督府率领驻扎满洲的两个师团统治着关东州，同时与领事馆争夺满铁附属地外交权与警察权。满铁认为政府下达建设“土木、教育、卫生等有关的必要设施”的命令，同时也授与必要的权力，即行政权，故此应该掌握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

如此，都督府、满铁、领事馆三头政治的现状，时有出现，大岛都督和荻原守一奉天总领事致政府的意见书里，便是一种象征。大岛都督以为：“就现状而言，领事常常无视都督的政令，关东州外的都督府官宪与领事存在相互敌视态度”，指责“组织之弊端”。而荻原总领事，则阐述了下列

见解：“只有确立外相对都督的监督权，才能统一对满洲的政策”。

只是，围绕着满洲统治的基本方针，在重复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在军制上进行一种重要的改革，很有重视的必要。即明治40年（1907年）4月，满铁由野战提理部以及其他官宪手中接管了铁路，开始了营业，同时为了保护起见，在南满新设6个独立守备大队，配置在沿线各地，相应地将驻扎师团缩编为1个师团。在日本国管区内保留原番号，两年换防制的驻扎师团，以分散小部队驻扎在满洲要地，专以教育训练为主，一旦有事和独立守备队相配合，而且不管后来该师团的增强，以及独立守备队的增减等，有何变动，一直配合到太平洋战争为止，显示了很可观的“妙趣”。可以说这种“妙趣”，仅仅表现在与全面武装起来的驻扎师团和满洲特有独立守备队之间的有机衔接问题上而已。

像这样，勉强强强在南满有居住地的关东州驻屯军，其后经常出现政略性的行动，最初的例证，可以在中国辛亥革命中找到。

九、辛亥革命和陆军

明治44年（1911年），中国燃起的称为辛亥革命的烽火。以10月10日革命党占领武昌为转机，各地革命党在“倒满复汉”旗帜下一齐崛起，脱离清朝相继独立，一个多月之间天下的三分之二掌握在革命军手里。对邻国的动乱，日本政府（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以“日本帝国”近邻的名义，来防止产生共和国，并乘动乱之机使满洲地位更加巩固，以谋取对

中国国土的侵略。尤其是陆军的活动，更为活跃。”

陆军从革命以后，急于在满蒙造成更多的既成事实。10月14日，冈市之助陆军次官向福岛安正参谋次长照会了“清国暴动有关事件”，一份意见书。其中：“……由于长江沿岸的利益错综复杂，情况的发展趋势，我认为也有必要在该地协同出兵。尤其必须注意的，当事态已波及到华北之时，处于这种情况下的我国，一方面以保护满洲铁路为名，单独加强该地的守备，另方面决心采取向清国北部协同出兵的手段，乃属当然之事。当向华北方面及长江方向协同出兵之际，为而后居列强之首，在白河口、扬子江口必须独占有利之据点。鉴于过去经验，我国常在如此场合居列强之后有失机宜之感。为预测事变，海军力量应置于要地，以便应急，遇事总要讲究先发制人之手段，这是必要的。”积极出兵满洲、华中、华北的企图，充分表白无遗。

不知是否因此原因，于翌年11月以京奉铁路守备为名，从第3师团拨出步兵1个大队，编成中国北方派遣队，从日本派往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后来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的麾下。并于同年12月，从第十八师团选编步兵两个中队，机关枪一个队为华中派遣队，派遣到汉口。但这些派遣兵力都是小规模，并不是为之实现陆军的“积极出兵的企图”。

在陆军方面，明治44年（1911年）11月，计划往华北派第三师团，往满洲派第十二师团。看来日本政府对此态度是暧昧的，随之通知俄国，为出于维持秩序的责任，暂时增兵满洲，企图强行紧急把第十二师团派遣到满洲去。

在满洲，于第二年即明治45年（1912年）2月3日上

午5时，山海关北十几英里处的京奉线铁桥被炸，因此，北京发出的快车翻车，死伤近150名。对此除中国和第三国之外，甚至日本的天津总领事小幡西吉，也在怀疑是否是日本陆军为增兵满洲制造借口的阴谋行为。时至今日，黑白难辨，但是，至少日本陆军是最被怀疑的，这一看法是确定无疑的。事件发生在山海关附近，根据国际协定，日军负有警备此地的安全责任，而且当天是日军警备到达后，立即发生爆破的。假如，本事件是日本陆军的阴谋行为，即可说明是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强行进入满蒙，实现陆军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了。然而，结局是使日本政府对陆军的过激行动产生了戒心，因此，陆军计划增派两个师团的计划，未能实现。

十、满蒙独立计划的失败

满蒙方面，以辛亥革命的发生为时机，一部分日本陆军与民间川岛浪速（川岛芳子的养父）等人取得联系，推进了满蒙独立计划（第一次）。早在革命前，日本的一部分军人、政治家及以头山满为首的黑龙会，会同民间有志之士就计划在孙文打起旗号时，就予以援助，然后趁此机会，一举侵入中国大陆，对此做出了种种计划。其中代表的是川岛等人的满蒙独立计划。

川岛浪速抱有“宏图”，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途退学，远渡中国，是主张南北分割论者。当辛亥革命之际，在北京已有特殊地位，拥有相当的势力。他反对清朝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因无力收拾局面而不得已起用袁世凯再次上台。先是想谋害袁世凯，但是失败了。接着他想拥举肃亲王（清太宗的

嫡孙)在满洲举旗独立,同时,在蒙古令喀喇沁王(内蒙古喀喇沁部的王)和巴林王(内蒙古五部落之一王)举兵,策划建设满蒙王国。当然不仅是川岛等民间人士有这个企图,还有特派北京和内蒙古的高山公通大佐等陆军军人为其同党。不仅如此,还可以说当时的陆军本部就是这个初步计划的策源地。

如前所述,当时陆军本部往满洲、华北各派一个师团,是想在大陆上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如在此时,掀起一个满蒙独立运动的潮浪,是日本军方属实希望的。明治45年(1912年)1月30日在冈市陆军次官给星野金吾关东都督府参谋长的长篇报告中指出:“鉴于此时特别是大局,已发生酿成满洲一些纷乱事端,必须注意避免因过分小手小脚而失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尤其是在当地,关东都督府是满蒙独立计划的热心支持者。

高山、川岛等人,2月2日晚暗地里设法让肃亲王脱离北京,逃往旅顺(不凑巧因京奉线爆破事件所阻,6日到达旅顺)。都督府跟川岛等人商量,把肃亲王住处安排到民政长官官邸,给其以非常热情的招待。使他对时机渐渐有成熟的感觉。但是,川岛等人的最大失误,是完全没有取得外务方面的谅解。围绕满洲问题的陆军与外务的矛盾,在此事上有抬头之势。日本政府收到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的报告,通过福岛参谋次长,把川岛等人叫到东京,由内田外相严格命令停止行动计划。连参谋本部对满洲的策划也不得不表示绝望。

于是,陆军与都督府的策略目标从满洲离开,向东部内蒙古,就是说向喀喇沁王、巴林王的周围集中。但是,武器弹

药的运输队，突然于6月8日在大立户泡与吴俊升部下的骑兵队发生冲突，激战的结果，打死日本人13名，蒙古人9名，中国人30名，第一次短命的满蒙独立运动遂悲惨地失败了。

十一、最初的武装干涉

由于辛亥革命发生，加之是在都督府控制下的南满地区，发生了一次事件。于明治45年初，革命党企图向北京方面进发的同时，从海路由山东半岛附近出发在辽东半岛登陆，拟从满洲方面推翻清王朝，编成北伐第一军，由芝罘海面北上。

日本第二舰队司令长官吉松茂太郎中将，发出严重的警告书，禁止在辽东半岛方面的一切军事行动。然而，2月2日革命军北伐队伍约600人，由辽东半岛的尖山口登陆，在李家庙设司令部，并开展募兵活动。据称2月上旬已有1,700名士兵和两门大炮。对此清政府军队从满铁沿线方面大举南下。

革命军登陆的尖山口附近，是在日本租借地关东州北部，条约上规定是中立地带，并规定这里无日本官宪的准许，中国陆军不得进入。因此，日本政府曾两次前来质问革命军违反条约规定，2月13日向清政府军、革命军双方提出强硬的最后的备忘录，要求撤退到中立地带外边去。同时，以威胁的手段把关东都督属下的驻扎师团的一部分，派遣到中立地带内的金厂屯、万家岭和盖平。因此，清政府军和革命军在无可奈何情况下，从20日至23日向中立地带外和海上退去。就这样革命军由于日军干涉，从北方威胁北京的计划失